

THE CHARACTER OF NATIONS

BY
ANGELO · M. CODEVILLA

国家的性格

政治怎样制造和
破坏繁荣、家庭和
文明礼貌

[美]安吉洛·M·科迪维拉
著
张智仁
译

东

方

编

译

所

译

丛



BY
ANGELO · M. CODEVILLA

国家的性格

政治怎样制造和
破坏繁荣、家庭和
文明礼貌

[美]安吉洛·M·科迪维拉

著

张智仁

译

任晓

校

东

方

编

译

所

译

丛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家的性格:政治怎样制造和破坏繁荣、家庭和文明
礼貌/(美)科迪维拉(Codevilla, A. M.)著;张智仁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东方编译所译丛)
书名原文: The Character of Nations
原出版者: Basic Books, 原出版时间:1997
ISBN 7-208-03623-3

I. 国... II. ①科...②张... III. ①政治制度-影
响-经济-研究②政治制度-影响-社会生活-研究 IV. D0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3091 号

责任编辑 湛 嘉
特约编辑 汤中仁
封面装帧 王晓阳

·东方编译所译丛·

国家的性格

政治怎样制造和破坏繁荣、家庭和文明礼貌

[美]安吉洛·M.科迪维拉 著

张智仁 译 任晓 校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200001)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天马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 插页 3 字数 292,000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7-208-03623-3/D·629

定价 20.80 元

在所有人的眼中,君主做一件事,人们
就得为君主做许多事。

——洛伦佐·德·美第奇

中译本前言

对政治和政治现象的研究,是一门历史悠久的学问,中西皆然。而其中,国家又是自古及今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甚至有人把政治学径直视为国家学。

放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书叫《国家的性格》。国家还有性格吗?本书作者的回答是肯定的。而且,作者认为,一个国家的性格是跟一国的体制和制度有关的。这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问题。

本书的英文版,1997年由美国知名的基础图书公司出版。作者安吉洛·M.科迪维拉是意大利裔美国人,曾先后任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助手班子中的资深成员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现为美国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系教授,发表过多种著述。除本书外,他的著作还有《现代法国》、《军备控制幻想》、《当他人建造时:战略防御倡议的常识取向》、《战争目的与手段》(与保罗·西伯里合著)、《治国信息:新世纪的情报工作》以及《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等,并曾在国际上有广泛影响的《外交》(*Foreign Affairs*)杂志上发表过不止一篇文章。

这是一本承袭传统的比较政府研究路子的著作。作者在序言中也自认“这是旧式的政治学”。这一传统在政治研究中源远流长,可上溯至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作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

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曾比较了古代希腊 150 多个城邦的政体,写出了《政治学》一书,提出了“人生来便是政治动物”的著名命题。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城邦成为一个组合物就好像许多“部分”结成为一个“全体”。若要阐明城邦是什么,得先行研究“公民”的本质,因为城邦正是若干(许多)公民的组合。

在比较之中把国家与民族性格相联系,至少可上推至法国政治思想家孟德斯鸠。在他的代表作《论法的精神》中,他认为,人类受多种事物的支配,即气候、宗教、法律、施政的原则、先例、风俗、习惯等。结果也就在这里形成了一种一般的精神。“在不违反政体原则的限度内,遵从民族的精神是立法者的职责。因为当我们能够自由地顺从天然秉性之所好处理事务的时候,就是我们把事务处理得最好的时候。”同时,孟德斯鸠也相信,一种政制会产生一定的结果,能够形成一定的性格,从这种政制中也会产生出一定的习惯。《论法的精神》细致地分析了孟氏所赞赏的英国政制。

不能不提及的还有另一位法国思想家、作者在书中反复论及的德·托克维尔。1831 年 4 月,托克维尔与好友博蒙借法国酝酿改革监狱制度之机,远赴美国考察其受到欧洲各国重视的新监狱制度,在美国旅行考察了 9 个月。1835 年,托克维尔的成名之作《论美国的民主》上卷问世。1840 年,《论美国的民主》下卷出版。在这部巨著中,美国的“民情”是托克维尔所考量的一个重要问题。他认为,孕育美国民主的民情扎根于历史上形成的新英格兰乡镇自治制度。这个制度早在 17 世纪开始形成,后经基督教新教的地方教会自治思想培养壮大起来。新英格兰的居民体会到这种组织形式的好处,产生了遵守秩序的志趣,理解了权利和谐的优点,并对其义务的性质和权利范围形成了明

确的和切合实际的概念。托克维尔把乡镇自治的传统看成是人民主权和美国人在实践中确立的公民自由原则的根源,同时乡镇自治制度也培育了美国独特的民情。托克维尔所使用的“民情”一词,在他看来,不仅指通常所说的心理习惯方面的东西,而且包括人们拥有的各种见解和社会上流行的不同观点,以及人们的生活习惯所遵循的全部思想。因此,托克维尔认为民情是“一个民族的整个道德和精神面貌”。美国人特有的民情,是使全体美国人能够维护民主制度的独特因素。

在 20 世纪,政治学的研究不管是内容还是方法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美国,政治学者所做的工作当中,数量分析触目皆是,理性选择大行其道。但是,科迪维拉教授对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的政治研究传统情有独钟,“从我一开始工作,我就宁肯要旧的政治科学而不要新的政治科学”(序言)。这种“旧的政治科学”所用的方法不是定量研究,不是大量使用计算机进行复杂的数据分析,或者用理性选择的逻辑,从个体和个人在不同情形下的行为选择出发,进行推理、演绎,而是比较的、宏观的,是努力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去捕捉、概括和归类,试图抓住大问题。本书作者的努力是否成功,要由每一位读者来作出评判。

作者讨论的是国家的性格。这使我们想起了 national character 即“国民性格”或“国民性”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使人感兴趣的题目,它潜移默化地在一国的政治发生着影响。然而,它又是容易把握的。关于这方面的学术研究,英国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欧内斯特·巴克于 1927 年出版的《国民性及其形成中的诸因素》一书,是到目前为止我所看到的最早的一部著作。巴克在此书中鲜明地指出:“懂得各民族的心理基础和总体性格的人握有制定政策的金钥匙。”(1948 年修订第四版序言)他认为,英国人在社会组织领域最伟大的贡献或许不是议会,而

是习惯法；甚至可以说习惯法比其他任何一种力量都更为深刻地影响着英国人的行为和性格。

我以为，国民性是有层次的。民国性格有表层的反映，如婚姻、家庭、社会流动性等；国民性格也有深层的反映，它对政治的影响表现为政治文化，更准确地说是政治精神。

不过科迪维拉教授所要论证的，是政治和政治体制是否和如何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这个问题是有启发意义的。苏联70年的历史就颇有深思的必要。在苏联的体制下，这个地跨欧亚的国家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实现了相当程度的工业化，并在坚强的领导下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这种体制之长，在于它具有某种赶超能力，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集聚起巨大的力量来实现一个目标。但是，它也有两个致命的弱点，第一是这种体制没有一种“防错机制”，不能防止决策出现重大错误。而一旦决策发生重大失误，就有可能使整个国家都经受巨大的、全局性的震荡。第二，它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人民的创造性，至少不能充分激发人的创造活动。这样它在一个较长的时期中就难以为继，无法进行持久的竞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现出劣势。于是，苏联的体制塑造了这个体制下的人僵硬、呆板、不敢想、不敢做的性格，社会缺乏活力和创造性，也就终非长久之计。

“性格”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的制度结构可以形塑不同的性格；或者说一国的性格在不同的制度条件下会有不同的表现。例如中国和中国人在改革前与改革以来的性格就是一个鲜明的对照。原先由于受制度性的束缚，人们形成了谨小慎微，不敢越雷池一步，唯恐犯“政治”错误的性格。改革使制度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带来了国家和国民性格意义深远的改变。但是，一国“性格”中也有恒久不变的部分，这历久而不变的是深层的政治文化或政治精神。美国和日本同是某种民主制度，但政治

精神却十分不同。即便是同文同种的国家,美国实行总统制,英国实行议会制,政治精神亦不尽同。

这本书有一个很核心的也是贯穿全书的概念,即“regime”。这是一个不容易把握和翻译的英文词,汉语可以有多种译法,如可以译为政治制度、政体、政权、管理制度等。“regime”在本书中究竟指的是什么呢?作者是有所界定的。在导论中作者称,“regime”是“政府和与之有关的既成权力体制”(第7页)。在第一章又进一步说,“regime”是“社会中突出的东西的总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爱和恨、风尚和恐惧、赞歌和称号。这些都体现在精英身上——既成的权力体制。”(第40页)中文中确实很难找到一个能很好对应的术语。

没有一本书是完美无缺的。本书作者科迪维拉教授对他过去的意大利同胞马基雅维里有深入的研究,对另一位欧洲思想家托克维尔也有很好的把握,但是在我看来,他对马克思的理解可能是肤浅的,未必准确的。有些看法读者完全可以不同意。但这本书所提出(或再次提出)和强调的政治如何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这一问题,却是有经久思考价值的。因此,我相信这本书会在人文社会科学多个领域的读者和研究者中获得知音。

任 晓

2001年1月于复旦大学

序 言

当 20 世纪 50 年代我作为一个意大利青少年学做一个美国人时,我痛苦地看到了人类变化的可能性。希腊古典作品教导我,习惯和环境会造成非常不同的生活方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描述了莱库古立法如何使斯巴达人变得顽强,而梭伦立法如何使雅典人的扩张变得有道理。所以修昔底德认为,如果一定数目的希腊人堕落得处于野蛮状态,那就是因为马其顿野蛮人采纳了希腊的生活方式。如果没有人们的性格和政治制度升降缠结的故事,罗马的历史会是怎样的呢?由于我贪婪地阅读关于遥远的年代和地方的书,我感到惊奇的是,我正在像我所读到的人们那样生活,而我的新国家则变成了可说是另外一种东西。

作为一个学生,作为一个海军军官,作为美国政府委派的一个文职人员,作为一个顾问、研究人员、讲师、旅行家,我被特许深入到几乎是世界上的每个角落并谈论世界及令人感兴趣的人民。这种情况加强了我对习惯和偶然性的补偿力量的恐惧。大体上,人民的生活主要是遵循旧的模式。尽管如此,生活方式的改变部分地是因为要使自己成为“新模式和秩序”的拥护者。马基雅维里说,这是世界上最难的事情。

我承认,我赞同约翰·亚当斯的《保卫美国宪法》,这本书考

察了世界上的各种政治体制,它发现,想象世界上的各民族使自身深深陷入不幸、暴政、腐败和迷信是容易的,但却较难想象他们培养得使自己进入繁荣、文明礼貌、体面和美国人民在其建国时期那样的虔敬。事实上,亚当斯认为,美国人应该认识到,他们坚持勇敢地承担对自己幸福的责任是多么危险。所以我确信,“新模式和秩序”必须在文化领域里施行,并且它们不可能完全像败坏人的性格那样改进人的性格。

政治学,正像亚里士多德奠定的那样,其主要对象是了解政府的某些形式和行为所产生的对人的后果。我们这个时代的几次大暴政,要求政治学去解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改变得那么多。当我第一次漫游德国时,使我难以相信的是,我所看到的稳健的自治市的自由民却曾经是大屠夫一帮里的人。是什么东西导致他们那样做呢?我在大学里学习的政治学几乎没有给我一点线索。但汉纳·阿伦特同亚里士多德的解释一样,政治制度如何制造出令人失望的陈词滥调。我读到过,苏联在一个甚至是更大的规模上实施过谋杀。阿瑟·科耶斯特勒和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都比政治学家更确切地解释了其原因。正在用索尼电器充塞着世界的礼貌得过分的日本人以前为什么会对太平洋沿岸各国施加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残暴呢?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解释了该国人民性格的一个方面如何不敌另一个方面。日本问题专家从事的是另外的方面。从我一开始工作,我就宁肯要旧的政治科学而不要新的政治科学,并且想要写一本关于比较政府的书,它采用的是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德·托克维尔、沃特·白哲特、布赖斯勋爵和费迪南·A.赫尔曼斯用过的样式。这本书也把世界上其余的政府同美国政府加以比较。

在结束了《战争的目的和手段》一书之后,我询问我的编辑——已故的、尊敬的马丁·凯斯勒,基础图书公司是不是对这

样一本书感兴趣,它的篇幅为 1200 页,内容是比较政府,它将描述当代世界主要政府形式中的每一种形式,解释每种形式如何影响在其统治下的人民促进经济繁荣、公民自由、家庭和精神生活以及培植军事力量的能力。我提醒他,古代人认为政治制度(regime)是多么重要,并提出我的书将描述世界上的主要政治制度。

马丁·凯斯勒没有说到整个计划,但说服我集中力量于把政治制度(regime)的概念重新介绍给今天的读者,集中力量于以前曾详细描述过的世界上各种主要的政治制度,集中力量于发展这样的主题:各国人民(民族)由于他们怎样统治他们自己而影响到他们的生活质量。

当然,我们对所有这一切感兴趣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生活方式的性格也许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令人向往,并且我们的政府和社会与其有联系的某些部分(我们的政治制度)都深深地影响到那种性格。马丁·凯斯勒去世后,基础图书公司编辑保罗·高洛布鼓励我甚至更集中注意于美国。像美国的政治制度不声不响地引起我们生活方面的巨大变化那样,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也正在传布关于社会工程的思想。这本书企图让一切社会工程感到踌躇,办法是说明他们所要拉动的有力杠杆真正同活生生的组织是联系着的,每一种改革方案都有合理地为人熟知的效果,以及效果之一乃是美国创始人所知道的派系斗争的那种致命病症。

既然这是旧式的政治学,所以它并不意味着证明任何东西。这是一篇把事实集合拢来的论文,因为笔者认为,这些事实指出了令人感兴趣的现象。注释是帮助读者核对引文、提供统计资料的出处,欣赏某些肤浅的想法,以及感谢那些我向他们学到许多东西的作者。这本书并不包含那些先前不为人知的事实。它

提供遥远地方和时代的经验以影响我们必须作出的选择。

除了马丁·凯斯勒之外,我很感谢一些同事,他们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格伦·坎贝尔领导下的10年中,以智慧丰富了我的头脑,并使我感到愉快。我很感谢已故的路易斯·冈,他在有关非洲、德国和英语方面深具智慧。我很感谢米哈伊尔·伯恩斯坦和罗伯特·康奎斯特,因为同他们就苏维埃政治制度讨论了多年。我感谢希尔顿·罗特,因为他洞悉中国和第三世界的经济。我很感谢托马斯·梅茨格和雷蒙·梅耶斯,因为他们教给我关于儒家和西方在台湾的影响的知识。我还感谢达拉斯大学的托马斯·韦斯特和克列蒙特研究所的全体研究人员,因为他们同我讨论了美国创建时的性格;感谢赫尔奈·库比洛斯,他曾就1973—1990年的智利革命与我作过无数次的对话。我感谢梯姆·杜冈,他能够为我基础图书公司解决了不少细节问题。我还感谢帮助我进行研究的波士顿大学研究生大卫·科尔宾和卡特·派克斯以及本科生梅瑞狄斯·威尔逊。对于书中全部解释和有错误之处,由我单独负责。

目 录

中译本前言	任 晓
序言	1

导论	1
----------	---

第一部分 政治制度与性格

第一章 政治制度	27
第二章 氛围和性格	51
第三章 民主的性格	75

第二部分 政治制度造成哪些差异

第四章 苏联	95
第五章 繁荣	121
第六章 文明礼貌	155
第七章 家庭	188
第八章 灵魂	215
第九章 终极考验	238

第三部分 美国的性格

第十章 德·托克维尔笔下的美国·····	261
第十一章 我们正在为我们自己做什么? ·····	283
第十二章 文化战争·····	327
第十三章 美国的保卫者·····	363
人名对照表·····	380
译者附言 ·····	张智仁 396

导 论

日复一日,案复一案,[最高法院]忙于设计一部我所不承认的国家的宪法。

——最高法院法官安提宁·斯加拉
罗默诉伊文思案

至少直到最近,美国人都有理由对政府漠不关心。我们知道,政府不能使我们变得富裕或聪明(更不用说善了),并且我们很希望政府不使我们陷入贫困和堕落。我们的常识告诉我们,人民使他们自己变得贫困或繁荣,使他们自己变得自由或受奴役。此外,直到最近,美国人认为,我们在很久之前曾经断然对成为何种人民作出了选择,并且我们并不怀疑,由于我们全力对付目前的问题,所以我们长期地在改变我们的习惯。我们曾经断定,未来带给我们的只是更多的财富、自由和幸福,而我们现在认识到,一系列的可能性要广泛得多。

任何 40 岁以上的人都很有兴趣地认为,我们居住的美国乃是一个与我们曾在那里成长的美国不同的国家。我们使我们的生活各方面发生变化:我们如何抚养孩子,我们期望于未来的什么东西会使物质和技术的变化相形见绌。当我们问我们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变化时,我们通常都会兴奋地谈到政府。

我们然后想知道,我们如何才能进一步改变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政府所做或不做的事情如何才能使我们理想中的或我们梦魇中的生活有所区别。由于我们可以同意,我们的性格形成我们生活的极大差异,所以我们认识到,政府影响公民的性格,正如公民的性格形成政府一样。无论我们打哪儿开始,我们都被迫去处理我们如何管理我们自己和我们如何生活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试看纽约市的生活。1994年7月,长时期的深思熟虑之后,市政府决定,对一丝不挂地乘地铁的人可予以拘捕,但只能是因为这个人在抽烟。早先一代的该市官员会毫不犹豫地保护社区反对“下流的曝光”,但到1994年,已很难找得到一个能说明这一概念的官员了。不过官员之间广泛地同意,乘坐地铁的人应受保护而不受二手烟的侵害,这是这些官员的父母一辈子闻所未闻的。从不能容忍在公众场合赤身裸体到不能容忍在公共场合抽烟的变化,确实是美国公共生活革命的一个缩影。

或者考虑这样一个场景: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之前,在暮春任何一个星期五的夜晚,纽约街道到处都是游荡着的身穿小夜礼服和长袍的成双结对的舞伴。一对对的舞伴会把酒吧关了,把面包店打开,注视着太阳从斯泰登岛的渡口或纽约市各座大桥升起。很少有人会担心他们的安全和失去自制。而今天,啤酒店为18岁的人服务是一种犯罪,在美国城市的街上游荡到天亮的任何一个人都会被怀疑具有自杀的本能。

或者考虑到这样一个现象:十分偶然地,一对十几岁的情侣中的少女怀了孕,典型的做法是接着来一次突击结婚。这给所有人的教训是,正像那时候人们所唱的,“恋爱和结婚走到一起,就像是一匹马和一驾车”。而今天,马和性之车(甬提爱了)同婚姻,越来越无关了。三分之二的黑人孩子和五分之一的白人孩